

我的父亲邓宝珊将军

□ 邓宝珊 口述 / 秦颖儒 整理

邓宝珊，原名邓瑜，字宝珊，甘肃省天水市人，生于1894年。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、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、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，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国防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，甘肃省省长等。1968年11月27日，因病在北京逝世，终年74岁。

父亲出身贫苦，兄弟姊妹共五人，上有一兄一姐，下有一妹一弟。祖父去世后，家里生活越发困难，父亲不得不辍学谋生，打短工补贴家用，主要是给修房、盖屋的泥瓦匠当下手，干些递砖、和泥的累活。因为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，父亲年少时就极富同情心。1909年，湖北新军标统杨贇绪部调驻伊犁，过兰州募新兵，不满15岁的父亲应募入伍，远赴新疆。在伊犁，父亲有机会结识同盟会成员，进而接受三民主义，遂投身于争取民主、共和的革命事业。

一

1921年11月，父亲因不满接受北洋政府改编，曾与孙中山先生联系，反映情况，孙中山先生曾亲笔致信父亲，鼓励其“坚持初志，百折不挠”。1924年1月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，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，并提出“以俄为师”，邀请苏联顾问，接受苏联援助。父亲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。同年10月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，父亲任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，他积极追随中山先生、拥护新三民主义，并联名电请中山先生北上。父亲一生追求进步，支持为国家命运而英勇奋斗的进步人士和进步力量，像刘伯承、邓小平、杨嘉瑞等共产党人都与父亲结下了深厚友情。

说到父亲与邓小平的交往，要从北伐时期说起。1926年10月中旬，国民军联军援陕先锋队到达陕西，父亲率领部队立即投入了参加西安解围战斗的准备。这时，父亲曾在所部驻地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，聘请了邓希贤（邓小平）等共产党人

为政治教官，对部队骨干进行革命教育。邓小平是应冯玉祥要求离开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工作的。当时邓小平在该教导队任政治教官（后到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部主任），黄展云就是这时由邓小平介绍入党的。黄当时是父亲部队的一名团长。其后，父亲又与刘伯承有了接触。1927年5月，刘伯承在泸州、顺庆起义失败后，突破重重围困，逃出了四川，取道西安，准备前往武汉。到西安时，刘伯承将仅剩的两块银圆作了抵押后，剩下的只是一些铜角子了。后来通过于宝轩，找到父亲的秘书长葛霁云，请葛向父亲陈述，希望给予支援。父亲这时尚在陕西，听了葛的汇报后，立即让葛拿600银圆送给刘伯承，并写信让有关部门开具通行证，以便行走。刘伯承接到银圆和路条后，深为父亲的雪中送炭而感动。

说到杨嘉瑞，他曾与父亲相处数年，做过父亲的随从副官。1932年，父亲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，中共不少地下党同志也来到兰州，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特别支部，其中杨嘉瑞是支部委员。1932年冬，杨嘉瑞向我父亲讲了他是共产党员，当过红军团长，我父亲听后郑重地说：“共产党我是同情的。”以后还送给杨嘉瑞200块银洋和羔子皮袄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杨嘉瑞曾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、兰州军区副司令员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

二

内战爆发后，一心厌战的父亲被迫卷入内战旋涡。1948年，父亲经历了从徘徊、痛苦到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绝望而下定决心起义的过程。

1948年冬，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。在战局对国民党守军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，华北“剿匪”总司令傅作义产生与共产党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。在傅作义举棋不定的情况下，他的结拜弟兄、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马占山说：“你自己的刀割不了自己的把，老大献言，老三为难，请老二出面事情就好办了。”马占山、邓宝珊、傅作义三人是结拜弟兄，马为大、邓居中、傅最小。傅作义深知我父亲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颇深，邀请我父亲出面谈判是最佳人选。

傅作义如绝处逢生，立即电邀并派他的专机去绥远接邓宝珊到北平议和。12月28日，邓宝珊飞抵北平，与傅作义竟夕长谈，分析时局，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思想逐渐明朗。1949年元旦后，平津解放军司令部提出让傅作义派出一位“有地位、能负责的代表”继续谈判。傅作义遂委任邓宝珊为北平和平首席代表，最终促成与中共高级将领林彪等人在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协议上签字。

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十分重大，不仅保护了闻名于世的文化古城、文物古迹，保护了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而且为解放地区树起了和平解放的“北平方式”，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。当时北平出版的《新民晚报》曾发表文章，标题是《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——邓宝珊将军》，高度评价了父亲对北平和平所起的作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，父亲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、省长。

三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父亲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、省长时，在其私宅兰州广武门后街邓家花园居住。1957年4月5日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兰州视察工作，他忙中抽闲，和秘书到邓家花园看望我父亲。20世纪50年代，邓宝珊已将邓家花园交公，邓小平得知此事后，立即指示省委退还。1964年“社教运动”开始后，又将邓家花园交公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省委又将邓家花园交还我们，后来我们姊妹商量又捐献给国家。现在由省政府邓园管理所管理，是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1984年，邓小平为全国政协、陕西省政协、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联合编辑的《邓宝珊将军》史料专辑题写了书名。1987年，邓宝珊将军纪念馆在甘肃省天水市落成，天水市委呈文中央办公厅请邓小平同志为邓宝珊纪念馆题字，邓小平欣然命笔，题写了“邓宝珊将军纪念馆”匾额。

父亲一生光明磊落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我们永远怀念他！

1933年6月26日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（以下简称：中革军委）在江西瑞金发出《关于“八·一”国际反战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》指出：“为纪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，确定‘八·一’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的日子。”同时，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也颁布了《“八·一”纪念宣传大纲》和宣传标语、口号等。

当时，蒋介石正在调集军队，筹划对中央苏区第五次“围剿”，面临重兵压境，为增强信心、鼓舞士气，粉碎敌人“围剿”，中革军委决定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誓词》（以下简称：“誓词”），在“八·一”纪念活动中举行宣誓仪式。

1933年7月16日，红军总司令朱德、总政委周恩来联名发布《关于“八·一”纪念活动办法》的命令，指出：“决定于红色‘八·一’节举行检阅、宣誓、授章和典礼……”。

同年7月27日，经中革军委集体讨论、修改、定稿，“誓词”首次正式颁布，同时发出训令：“本委员会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，以备‘八·一’纪念日及最近期间内诸新成立红军部队举行宣誓之用。各级指挥员务须先负责详细讲解，使每一个红色军人都能彻底了解和遵守为要。”

同年8月1日，中革军委在瑞金叶坪村隆重举办“八·一”庆典，参加宣誓、阅兵的5千多名官兵全部集结待命。17时整，周恩来宣布庆典开幕，首先由朱德颁布“誓词”：“（一）我们是工农的儿子，自愿来当红军，完成苏维埃给我们的光荣任务，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。（二）我们是红色军人，要保证自己和同志们绝对遵守和服从苏维埃的一切法令，并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做模范，努力学习政治军事，爱护工农的利益和自己的武器，使他不得遭损害和掠夺。（三）我们是苏维埃柱石，誓以我们血与肉发展民族革命战争，实行土地革命，推翻国民党，保障苏维埃，打倒帝国主义，争取中国解放，武装保卫苏维埃，完成革命，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。（四）现在敌人正在大举进攻，我们要团结一致，拿我们刺刀和枪炮与敌决一死战，拿我们头颅与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。（五）我们为着阶级利益遵守革命纪律，服从上级命令，如若违犯和不忠实甘受革命纪律制裁愿听同志斥责。谨誓。”

颁布完毕，全体官兵庄重地举起右拳宣誓，朱德宣读“誓词”每条的前两句，官兵们齐声跟读，铿锵豪迈的誓

中共首次颁布的红军誓词

□ 周铁钧

言传彻会场，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赋予人民军队的初心与使命，彰显出红军坚定的政治信仰、鲜明的阶级立场，不怕牺牲的必胜信心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。

宣誓完毕，在嘹亮的鼓号声中，检阅开始，官兵们整齐地扎腰带、打绑腿，虽许多人的军装打着补丁，穿着草鞋，但步枪、手枪、警卫、军校等方队在一面面战旗的引领下，排列齐整、昂首阔步，队队威风凛凛、人人气宇轩昂。

“八·一”庆典过后，中革军委将“誓词”大量印制，在苏区广泛散发、张贴，红军各部队每有集会活动、战前动员等，都要重温“誓词”，举行宣誓仪式，以凝聚精神、鼓舞斗志、增强信心。

“誓词”的颁布，也使整个苏区民众支援红军、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空前高涨，瑞金、永丰、会昌、于都等县有大量革命青年加入工农子弟兵队伍，很快使红军总数壮大到近30万人。

1933年10月，国民党集结百万兵力，开始对苏区第五次“围剿”，红军将士团结一心、同仇敌忾，虽敌众我寡、实力悬殊，但他们以“誓词”为激励，英勇顽强、无所畏惧、主动进攻，到处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

珍赏



鹊影菱花满光彩

□ 李笠清

青铜镜，是一种用青铜制作的古老的使用器具，在我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。古人将青铜铸镜磨光亮，作为照面饰容的生活用具，镜背则雕刻各种精美的纹饰，使铜镜充满了厚重的文化艺术气息。历史上遗存下来的青铜镜，许多还有着特殊的人文内涵，如唐代孟郊所撰《本事诗·情感》所载，南北朝末年，陈朝驸马徐德言与妻子乐昌公主于陈亡前破镜为两半，各执一半，相约作为夫妇失散后将来重新团聚的信物。数年之后，得越国公杨素成全，二人终凭破镜合璧，夫妇得以相携终老，在诠释一段忠贞爱情的同时，亦留下“破镜重圆”的佳话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出自青铜镜的故事，而有些铜镜在制作时，特意将一些风土人情、神话传说、史载典故及寓意美好的事物镌刻于镜背，寄托了古人的祝愿与情感，铜镜就是其中耐人寻味的一种铜镜。

唐四鸟绕花枝菱形镜，菱形，半球形钮。镜面平整光滑，光可鉴人；整个镜背就像一朵绽放的菱花，镜缘八片花瓣中间间隔饰有四只蝴蝶和四枝花叶，蝴蝶呈翩翩起舞状，动感十足。中间为内切圆形，沿镜钮一圈，雕饰两只长尾喜鹊和两只短尾鸟雀，喜鹊敛翅歇息，呈静立状，鸟雀则展开双翼，呈飞翔状，分别为上下和左右相对，之间以折枝花卉间隔，图案活泼，动静有致，生动自然。铜镜是唐代金属铸造业中最突出的产品，以造型多样、题材丰富、工艺高超著称。唐镜中的禽鸟绕花枝镜类，以菱花形居多，周边配以蜂蝶花枝各四组，内区纹饰布局一般都是四禽鸟同向排列绕钮，其间配以花枝，禽鸟主要有鸳鸯、喜鹊、雀鸟、兔雁等，静立、飞翔或



浮游均有，画面简洁清晰。这件器物形态美观，铸制精良，纹饰细腻，内涵丰富，鸟绕花枝，仿佛一幅花鸟小景，体现了唐代铜镜制作工艺的精湛水平。

铜镜之名的来历，与我国古代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关。据编纂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的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七一，引西汉著名文学家东方朔撰神话志怪小说集《神异记》载：“昔有夫妇将别，破镜，人执半以为信。其妻与人通，其镜化鹊，飞至夫前，其夫乃知之。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，自此始也。”这个传说讲的是有一对夫妻分别之际，将一面铜镜破为两半，二人各执一半，以为夫妇忠诚于爱情的信物。后来这个妻子在家与人私通，那半面铜镜化为鹊鸟飞到其丈夫处，其夫因而知道了妻子背叛自己的不贞之事。古人为了避免出现闹房不谨、夫妇不忠的事情发生，根据东方朔的神话传说，特意将喜鹊作为铜镜的装饰纹饰使用，大有警醒世人要忠诚于

婚姻家庭的意味，故后人常以“鹊镜”来比喻夫妻之间感情的忠贞。由此，鹊镜作为古人梳妆照容的生活用具，多被女子用作闺房之物，同时亦被历代诗人吟咏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长达100多字的《杂曲歌辞·妾薄命》，描绘出一幅丈夫出征常年在妻子在家独守空房的寂寥惆怅画面，寄托了女子希望早日与夫君“愿君朝夕燕山至，好作明年杨柳青”的团聚期待，其中“彩鸾琴瑟怨声多，飞鹊镜前妆梳断”之句所提到的“鹊镜”，就是这种寓意特殊的青铜镜。清乾隆年间戏曲理论家、诗人李调元，亦吟咏过“忽见虹桥天半跨，恍如鹊镜月中窥”的诗句。

鹊，即喜鹊，形体优美，叫声响亮，旧俗以闻鹊声为喜兆，我国民间将之视为吉鸟，有“报喜鸟”之称，晚唐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称之为“人若见之，主福贵也”“俗言见鹊上梁必贵”的瑞鸟。在我国民间，鹊还是爱情的象征，唐末韩鄂《岁华纪丽》卷三引《风俗通》载：“织女七夕当渡河，使鹊为桥。”说的我国民间脍炙人口的牛郎织女神话传说，每年七夕，织女通过喜鹊搭起的鹊桥去与牛郎相聚，而织女通过鹊桥，是以鸣鹊的身份，按照民间“鹊巢鸠占”的习俗，到牛郎的住处“鹊巢”与之相会。

唐代铜镜对花鸟纹饰的使用较为广泛，取吉利祥瑞之意，常以鹊鸟来进行装饰。“嫁时宝镜依然在，鹊影菱花满光彩。”唐代诗人薛逢《追昔行》中的诗句，形象地描述了鹊镜的形状与纹饰，其意蕴与这面鹊镜纹饰的主题深相契合，寄托了古人对夫妇之间举案齐眉、相携到老之家庭人生的美好向往，令人睹镜怀古，感慨万千。

我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

□ 冯忠芳



1884年中法福建马尾海战和1904年中日甲午海战连连失败的惨痛教训，使国内一些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发展海军，建立学校，培养人才，自己设计制造飞机，以图强雪耻。1914年，飞机和潜水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刚投入使用，就受到中国军政界的高度重视。1915年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刘冠雄首先提出要创办海军飞潜学校。1916年2月，海军栋梁陈绍宽、李世甲赴美考察，学习飞机、潜艇的操作和制造技术。留英学生巴玉藻、王助、王孝丰、曾贻经等四人奉命转赴美国学习飞机制造和航空方面的专门知识，抱着立志献身于祖国飞机制造业的志向，他们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成回国，成为中国第一代制造飞机的专业技术人才。

1918年初，海军福建马尾船政局设立飞机工程处，任命从美国学习航空工程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巴玉藻任主任，王助、王孝丰、曾贻经等任副主任，由曾贻经负责财务，巴玉藻负责设计，从事飞机设计制造，同时负责海军飞潜学校工作，将飞机制造和航空人才培养连成一体。这就是中国早期比较正规的飞机制造厂。

马尾飞机工程处选址在马尾造船厂西北滨江处，开办之初，巴玉藻、王助等人把船政局内旧厂房改建为车间和办公室，以船厂为基础，又扩建了飞机装配厂和机库，还在江边铺设了飞机滑行道。由于经费困难，只好利用锯木床、刨床、车床、钻床等造船机械设备。最初，选择进入工程处的近50名木工、机工、钳工、油漆工都是船政局最优秀的能工巧匠，配上机灵的几十个学徒，组成了中国第一批飞机制造产业的工人队伍。他们除了劳作之外，每天下午定期学习专业技术。与此同时，马尾飞潜学校的各班毕业学员，也大部充实到飞机处的工程技术、管理部门。随着飞机设计制造的需要，技术人员和工人队伍不断扩大，由开始100多人，发展到300人。这是中国第一代经过自己专门训练的飞机制造技术人员和工人。当时，制造飞机所需的钢、铝等金属材料及发动机，国内不能生产，只能从国外购买。需要的大量木质材料则选用国产木材，于是，第一架国产飞机用上了产自武夷山的木材。在很简陋的条件下，巴玉藻、王助他们终于在1919年8月造出了名为“甲型一号”的双撑双翼水上飞机。它是一种利用水面滑行继而升空的飞机，性能一点也不低于同时代欧美各国。鉴于国产飞机的首制成功意义突出，北洋政府总统曾发出嘉奖令加以表彰。

1923年，马尾海军船政局飞机工程处改组为海军制造飞机厂，归属海军司令官署。1931年1月，全部迁到上海，归并于海军江南造船所。从1919年8月到1930年10月，前后13年，马尾飞机工程处的工程技术人员呕心沥血，共造飞机15架，除第一架和第五架海鹰一号双翼飞艇试飞失事外，其余均安全飞行。在马尾制造飞机，虽属我国飞机制造业的萌芽阶段，但在我国航空史上，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起到了首创奠基的作用。